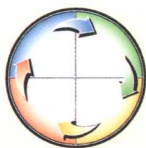


Fengxian Guanli De
Renwen Daoxiang



风险管理的 人文导向

刘婧 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 京 出 版 社

Fengxian Guanli De
Renwen Daoxiang



风险管理的 人文导向

刘婧 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 京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风险管理的人文导向 / 刘婧著.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10. 4

ISBN 978 - 7 - 200 - 08224 - 1

I. ①风… II. ①刘… III. ①风险管理—研究 IV. ①F272. 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71986 号

风险管理的人文导向

FENGXIAN GUANLI DE RENWEN DAOXIANG

刘 婧 著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 版
北 京 出 版 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 100120

网 址: www.bph.com.cn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880 × 1230 32 开本 8.625 印张 217 千字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0 - 08224 - 1 / F · 420

定价: 25.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 - 58572393

目 录

导 论 风险社会的来临	1
一、无法规避的境遇	1
二、风险管理的转型	13
第一章 风险概念与风险管理	28
一、风险的内涵与特征	28
二、风险的多维解读	50
三、风险管理的发展趋势	57
第二章 风险呈现与风险识别	75
一、当代社会风险的呈现	75
二、风险识别的现实障碍	114
第三章 风险认知与风险沟通	136
一、风险认知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意义	137
二、风险认知的影响因素	147
三、从风险认知到风险沟通	179
第四章 风险反思与社会发展	201
一、现代性的审视	201
二、责任伦理的建构	215
三、发展理念的调整	237
参考文献	258
后 记	272

导论 风险社会的来临

一个人无法选择自己的时代，却能够把握时代发展的主动权。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幸运，也是所有时代人的幸运。每个时代的人都应该发现他们生活于其中的时代的变革，这是时代赋予他们的使命，而学者应从理论层面及时地、前瞻性地预测、凝练这种转变，这恰是学术发展的真正价值所在。

如果我们检视人们对时代的概括，就不会漏掉一个近乎刺耳的声音——“风险社会”。在这样的时代，我们需躬身思考：管理学何为？管理哲学如何回应时代境遇的挑战？这是我们把握时代的一种方式。管理对象的转变、管理重心的转移、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交互关系的形成和管理目标的转变，是当代管理学乃至管理哲学的重大变革。

一、无法规避的境遇

在世纪之交，多数人以一种乐观的情绪期待未来的岁月，但进入新世纪后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却给人们这种乐观的情绪蒙上了阴影。特别是美国“9·11事件”和中国非典的危机，以及此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使世人陷入了一种莫名的恐惧之中。这些事件似乎提醒我们：社会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人类前进的步伐总是与风险紧紧纠缠在

一起：一方面，人类通过斗争逐步从贫困、饥饿、疾病等传统的风险束缚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人类却又被越来越多的来势凶猛的新的风险威胁所包围。从“温室效应”、沙尘暴、酸雨、土地沙化、臭氧空洞、气候变暖、厄尔尼诺，到转基因食品、疯牛病、禽流感；从水源食品污染、电力恐慌、石油危机，到印度洋海啸、金融危机、绑架人质事件等，这些风险的存在无不表明：世界突发事件在增多，不确定性在增强。更为重要的是，今天人类面临的很多风险已与传统的危机有了本质的区别，其传播的深度、广度和破坏性都是以前无法想象的，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有的一旦发生甚至会毁灭人类本身。难怪“风险社会”理论首创者贝克指出：“工业社会的社会机制已经面临着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种可能性，即一项决策可能会毁灭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这颗行星上的所有生命。仅仅这一点就足以说明，当今时代已经与我们人类历史上所经历的各个时代都有着根本的区别。”^① 所有这些都说明，当下社会的确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风险社会已经成为当今人类不可避免的境遇。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贝克于 1986 年首次提出了“风险社会”理论。在其《风险社会》一书中，贝克首次使用“风险社会”的概念来描述后工业社会进而加以理论化。随着现代性危机的加深，西方学者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对“风险社会”理论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渐渐形成一股研究热潮，人们从哲学、社会学、文化学、管理学等学科出发对其进行了解读，目前已是当今西方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而 21 世纪初所发生的几件震惊世界的风险事件更使“风险社会”的主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凸显出来。在我国有关“风险社会”理论的研究始于非典危机的爆发，对现实问题的关注使该理论迅速成为一门显学。近年来越来越多

^①（德）乌尔里希·贝克：《从工业社会到风险社会》，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 年第 3 期。

的学者涉足这一理论，力图用该理论来思考、解决中国社会面临的实际问题，风险社会研究迅速升温。

但是，“风险社会”何以可能？或者说，风险社会真的到来了吗？抑或它只是西方学者的话语虚构或理论预设？

许多学者都是从现实的角度来确证风险社会的来临。他们认为，风险的日益增多是全球化时代毋庸置疑的客观现实，上面列举的诸多风险即是很好的例证。荷兰学者沃特·阿赫特贝格直接指出：“风险社会不是一种可以选择或拒绝的选择。它产生于不考虑后果的自发性现代化的势不可挡的运动中。”^① 吉登斯也指出：“不管我们喜欢与否，有一些风险是我们大家都必须面对的，诸如生态灾变、核战争，等等。”^② 这事实上是一种认识风险社会的现实主义态度。在许多学者看来，我们之所以称现代社会为风险社会，是由于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而出现了许多新的、影响更大的风险，如危及全人类生存的全球生态风险，难以预料、难以控制的高新技术风险，以及诸如极权主义增长、种族歧视、贫富分化、民族性缺失等政治风险。还有一些风险虽然发生时是局部的或仅局限于某个领域，随后却能迅速导致或引发潜在的巨大的社会灾难。最后，越来越多的风险所造成的影响将不再像以前那样只局限于传统的民族国家疆界之内，而是会迅速地波及其他国家甚至全世界。例如，大家所熟知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事故、“疯牛病”和亚洲金融危机等，尽管它们开始时都发生在一个国家内部，但其灾难性影响却很快扩散到了其他国家。这些都表现出了现代社会风险与传统社会风险明显的差异。正是由于新的、后果严重的风险的频频发生，并且这些风险具备与以往不

①（荷）沃特·阿赫特贝格：《民主、正义与风险社会：生态民主政治的形态与意义》，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年第3期。

②（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29页。

同的特征，从而标志着我们正逐步进入风险社会。这种认识更多地来自于对社会现象的观察，是对目前人类所处时代特征的形象描绘，虽然有一定的客观依据，却缺乏对社会本质的深刻剖析。

与此相反，有的学者认为我们之所以称当代社会为风险社会，并不是因为现实生活中实际风险增多，而是因为人们对风险的意识加强了。今天的风险看起来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多、更频繁，实际上主要是因为我们加强了对这方面的关注，人们更多地注意了风险增加的情况而较少关注风险降低的情况。因此，在他们看来，风险社会是“指在一个社会，人们用‘风险’这个概念来描述和分析社会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确实远比以前生活在一个风险社会里”^①。而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研究风险的玛丽·道格拉斯和威尔德韦斯也反复证明：风险实际并没有增多，也没有加剧，只是被意识到的、被察觉到的风险确实是增多和加剧了。在他们的眼中，实实在在的风险本身并不重要，关键的问题在于是谁在认知并强化了风险意识与观念。可以看出，这种对风险社会的认识明显地带有强烈的主观主义色彩，风险社会的出现不在于客观现实中风险状态的改变，而是人类对风险认识加深的结果。

事实上，无论对风险社会的解释持现实主义立场还是主观主义立场，二者都没有把握问题的本质，也都没有找到对现实社会进行分析的真正的切入点，因此都不能令人信服地回答风险社会何以可能这一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存在论和世界历史思想为我们深刻把握这一社会现象提供了基本的方法。对风险社会的根源性分析，应该在哲学实践论和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的两个向度上展开。

首先让我们立足于实践存在论对风险社会进行历史性根源分

^①（德）斯万·欧维·汉森：《知识社会的不确定性》，载《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03年第1期。

析。风险社会的到来正是人类自身实践活动的结果。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从人们的历史存在或者实践出发解释一切问题的广义历史唯物论。对自然、社会生活以及人们自己的意识，只有从人们的实践活动出发才能得到合理的说明。因此，人类的物质实践活动是马克思主义用以分析和解决一切问题的基本立足点和出发点。马克思早就指出，人“周围的感性世界绝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代活动的结果”^①。“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②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角来看，各种全球性风险的存在无不根源于人类的现实实践活动，是人类社会物质活动的结果。从最一般的意义上来说，风险社会的到来，是人类改造自然、是自然“人化”过程的不可避免的后果。

与普通动物不同，大自然既没有赋予人类以完美的先天本能图式，又没有为人设计出特定的适宜的生存氛围，而是使人处于“未完成”状态，并不断面临着来自周围环境的严酷挑战与沉重压力。“内外交困”的生存境遇，迫使人不得不直面周围环境，走上了一条自我决定、自我完成与自我塑造的艰难道路。先天未完成与后天自我完成相纠缠，使人在依赖于自然的“施舍”的同时不得不设法通过实践活动摆脱自然的束缚，满足人类的需求。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通过自己的活动按照对自己有用的方式来改变自然物质的形态”，并“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③，从而使其从“自在之物”转化为“为我之物”。这样，自然由于人们的物质活动而被二重化为天然自然和人化自然，只有人化自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7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7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版，第87、202页。

然才是人类现实的生活世界。但是，由于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因此，人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并不是任何时候都能使自然“为我所用”，而客体在满足主体需要的同时也常常会表现出反主体性效应，从而不利于人的生存和发展。这样，自然的人化就在两个向度上展开：一个是有利于人的人化；另一个是不利于人的人化。无论是有利于人还是不利于人，这样的自然环境都是由人的活动创造出来的，都打上了人的烙印，在这个意义上都属于人化自然。而只有反人化的自然才对人的存在产生抑制作用与消极影响，才使人深陷于风险与危机之中。这里还必须注意到由反人化的自然所导致的风险与火山爆发、地震等纯粹的自然的盲目运动导致的风险不同，后者是自然自身运动产生的后果。从最宽泛的意义上说，风险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伴随物。因为由自然界的客观运动所导致的风险总是存在的，只要人们还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只要生活还以自然界为物质基础，就不可避免地要面对风险，地震、海啸、飓风等都是无法逃避的自然现象。但风险社会并不是这一意义上的概念，如果在这一意义上理解风险社会就把风险社会的概念泛化了。风险社会主要是指自然的反人化效应的结果。因此，风险社会是由人造成的，是人们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的必然产物。当然，风险社会所面对的风险不仅包括由于自然的反人化所形成的风险，还包括远离自然运动而“纯粹”属于社会的风险，比如金融危机、战争风险等，这类风险本身就是人们实践活动的产物，是实践活动本身。总之，风险社会中的风险不同于自然界的运动、变化产生的风险，而是人类历史实践活动的产物。

吉登斯、贝克等人对风险类型及其根源的分析给了我们有益的启示。贝克认为，自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由于科学技术加速进步，第一次现代化的副作用正在逐渐显露出来，生态危机的出现，自然与社会的对立便成了问题，自然，由于长期以来被

纳入工业化进程中去，因此变得危机重重。贝克称这一进程为风险社会。贝克认为，风险社会与以往社会最大的不同在于人为风险的增多。风险社会理论另一位代表人物吉登斯则从历史的角度和现代性的基础上考察分析风险社会，他把现代社会的风险分为两类：一类是“外部风险”。外部风险就是来自外部的、因为传统或者自然的不变性和固定性所带来的风险。这是在工业社会最初的200年里占主导地位的风险，这种风险虽然严重，却由于经常发生而可以预料。另一类风险则是“人造风险”。所谓人造风险，是指由于我们不断发展的知识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所产生的风险，是指在我们没有多少历史经验的情况下所产生的风险。它存在于自然和传统消失之后，是由人的发展，特别是由科学技术的进步所造成的。对于人造风险，历史没有为我们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和知识，我们甚至不知道这些风险是什么，就更不要说对风险的精确计算，也谈不上对风险结果的预测，这就使人们陷入前所未有的风险环境之中。外部风险是简单现代性条件下的风险类型，而反思现代性条件下的风险类型是人造风险。但只是在后一环境中，我们才置身于“风险社会”之中，我们才生活在后果严重的风险环境中。贝克和吉登斯都使用了“人化环境”或“社会化自然”的概念来描述风险产生的实践基础，可以确认，风险社会中的风险更主要的是指由人类活动所导致的风险。正如吉登斯所言：“我们生活在这样的社会里，危险更多地来自我们自己而不是来源于外界。”在这样的社会中，“我们周围的物质环境没有什么不受人类干扰的影响”。因此，后果严重的人造风险的普遍化是吉登斯认为人类进入风险社会的起点和标志。吉登斯、贝克等人从客观主义立场出发对风险社会进行了实践存在论的分析。吉登斯等人的分析在方法论上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原则上是一致的。但无论是吉登斯还是贝克都没有在这样的高度保持下去，而是重又回到了社会学层面进行学理分析。

人类实践的根本特征是物质性或客观性。从实践存在论的高度认识和理解风险与风险社会，就把对风险社会的理论把握置于客观的基础之上。这样看来，从主观主义立场出发说明“风险社会”就是不合理的，应当受到批判。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看，用以作为思考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不是某种意识或观念，观念只不过是现实的反映。同样的，风险社会之所以成为风险社会显然不仅仅在于人们强化了风险意识，而是人类物质实践活动的结果。

从人类实践活动出发解释风险社会，只是说明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只要人类在活动，总会导致并且面对新的风险，但是，风险的存在并不意味着人类进入风险社会。因此，人类实践活动只是风险社会产生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由此可见，仅仅从人类实践活动这一点理解和界定风险社会显然是不全面的。我们还要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来为深化对风险社会的认识寻找理论依据。风险社会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的客观后果，是世界历史的一个构成部分。只有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风险社会才成为可能。

无论人们是否承认，也无论人们持什么态度，全球化已经是当代世界发展势不可挡的趋势与潮流，成为理论言说的基本语境。按照马克思的话语，全球化的进程就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进程。随着人类实践规模的扩大，人类交往在世界范围内拓展，历史日益成为世界历史。对于全球化的发展，马克思主义者一直都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和研究。马克思虽未使用“全球化”的概念，但他早就发现和观察到了全球化的趋势，并从中预见到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全球共产主义的前景。在马克思看来，全球化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和发展而开始的。150年前，当资本主义用机器大生产、商品交换和分工国际化使世界普遍联系，使原本分裂的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之时，马克思就

指出了世界历史内涵着更大范围内的全球化发展的历史趋势。全球化不过是物质交往实践宏观拓展的形态。马克思在他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指出,大工业“创造了交通工具和现代化的世界市场……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①。“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② 马克思以其惊人的洞察力及超前意识,分析乃至预见全球化发展的趋势和路径,用“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这一命题表征了这一进程和趋势。当代世界的发展,越来越证明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真理性的。

马克思预见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将要席卷全球的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他认为推动全球化的巨大力量是生产力,即物质的、科技的力量,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宇宙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怪影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种行动。”^③ 因此,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点是建立在实践的唯物主义立场之上的。

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是人类实践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一趋势的客观后果是世界风险社会的到来。实践意味着风险,但是风险的存在并不意味着我们就生活在风险社会。只有当历史成为世界历史时,风险社会才成为可能。只有在世界历史背景中,人类交往才普遍提升,全球相关性才得到空前加强。每一局部、每一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1版,第6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8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89页。

区域甚至每一个体的活动不再是与其他局部、区域或个体毫不相关的，而是存在着根本性的密切联系。世界历史形成之前，风险只对人类产生局部的影响，而当历史成为世界历史之后，由于全球的高度相关性，风险不再可能只是对局部社会、少数人产生影响，而是对每个个体生命和生活存在着严重的威胁，每个人在全球性风险中无法逃避。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生活在风险社会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风险社会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的产物^①。

具体说来，全球化作为一个历史进程，其对风险的来源和后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首先，全球化大大扩展了风险的来源。全球化的核心内容是人员、物质、资本、信息等跨国界和大量流动的加速以及各个国家、社会、人群相互联系和依赖的增强。正如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② 全球化在建立、发展和膨胀了世界市场，不断地改变世界历史面貌的同时，也造就了各民族相互依赖的民族国家间关系的体系。全球化使各国的交往更加紧密，依赖性更强，关系也变得更加错综复杂。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由于生产要素

^① 庄友刚：《跨越风险社会——风险社会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276页。

流动的加强可能会使他国的风险直接输入其中，也可能由于与他国相邻受牵涉卷入风险中，或者一些外部风险发生后诱发了该国或地区类似的或其他种类风险的发生。总之，原来只限于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风险如今很容易扩散到周边的国家和地区，甚至会酿成世界性的灾难。这些风险在扩散的过程中，彼此间还可能产生互动关系，产生新的风险源，风险源的增加必然带来风险种类的增多，从而导致严重的风险后果。其次，全球化放大了风险的影响和潜在后果。风险影响的放大主要是通过两种渠道实现的。一是空间的拓展以及相互依存的加深必然使与风险源有关联的人数增多，这样，直接或间接受到风险危害的人数就会大大增加。在全球化时代，像多米诺骨牌一样，风险放大一旦启动其蝴蝶效应将是惊人的，某个初始条件十分微小的变化经过不断放大，很可能对系统未来状态造成极其巨大的差别，甚至会导致系统的分崩离析。二是发达的现代通信技术使人们了解世界各地发生的风险事件变得快捷便利，对风险潜在后果的意识也更强烈。同时现代通信技术的发展克服了时间与空间对人类交往的限制，提高了不同社会中的人群对同一事件的“在场感”以及经验、认识和知识的相互交流。而这种集体的关注和相互作用很容易导致大范围的过度恐慌^①。典型的事件就是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出现的金融危机的连锁反应，心理的恐慌放大了风险的破坏力。最后，全球化使当今的风险呈现出不同以往的显著特征。比如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复杂性、关联性、跨越时空性、扩散迅速、破坏力大、难以预测性、难以控制性等诸多特征。

在全球化背景下，风险社会成为了我们这个时代无法规避的境遇。全球化反映了人类现代实践活动日趋复杂化、多样化，实践涵盖着多维度、多层面的交往关系和交往结构的系统过程，呈

^① 杨雪冬：《全球化、风险社会与复合治理》，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4 年第 4 期。

现的是共时态与历时态、广延性与层次性、微观与宏观不断转化生成的形态，人类的实践活动日益丰富，却也给这个世界带来了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结果是，伴随着全球化进程，我们进入风险社会。马克思没有提出过“风险社会”的概念，没有从世界历史思想出发阐释过全球性风险问题，但是世界历史理论无疑为我们全面深刻把握当代风险社会提供了基本的理论依据。风险社会只有在世界历史的语境中才成为现实。

对风险社会的历史根源性分析还可以从其他方面作出具体的阐发，比如从对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对科技工具理性的审视等无疑都是有启发意义的。但是风险社会作为客观的历史存在，我们认为只有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和世界历史的角度出发，才能对风险社会的本质、特点、发展趋势作出根本性的把握，进而作出历史性的审视与批判分析。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风险社会是人类历史实践活动的产物，是全球化进程加深、历史成为世界历史的必然结果。

当然，我们并不是在历史分期意义上来理解“风险社会”概念，它也不标明社会和国家发展的历史阶段，它只是对目前人类所处时代特征的形象描述。如果从标明特定社会重大特征的意义上来理解风险社会，正如人们用“信息社会”、“网络社会”、“知识社会”来指称当代社会那样，风险社会就成为当今全球化时代我们不能不予以关注和研究的客观现实。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人类处于风险社会，风险社会是对目前人类所处时代特征的形象描绘，它更具有现实性和实践性。

综观当代中国，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我们已日益与世界紧密地融为一体，不可能再独立于世界之外，因此，世界每个角落发生的风险都与我国休戚相关。同时，我国正处在迅速的现代化进程之中，因此几乎所有“风险社会”理论所讨论到的缘于现代性的风险，在当代中国都或多或少地显现出来。但是，对于

当代中国来说更为重要的是，这种风险可能是叠加的或者是双重的，因为当代中国社会除了正在经历一个现代化的变迁外，还在经历一个巨大的体制转型变迁。相对于现代化过程中的工具性、物质性的变迁来说，体制、制度和社会结构的变革是更为根本的变革，这使得中国目前处于一种迅疾的、深刻的变动之中。这就要求我们在集中关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同时，重视对风险社会理论的认识和研究，并从战略的高度来寻求应对措施。这也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选择。

二、风险管理的转型

全球化时代，每个国家都不可避免地身处于“风险社会”之中。如果说以前管理处理的风险主要是区域性的和以自然风险为主的风险，那么，今后我们面对的将是更多地以人为风险为主的全球性风险。此外，风险冲击的强度和广度也与以往有了根本的不同。风险的威胁不再是局部性的，也不再是某个方面的，如经济的或政治的，而是整个人类生存和发展意义上的；同时，风险不再仅仅是客观的现象，还有主观建构的成分，公众对风险的主观建构本身就是一种风险。基于以上变化，当代风险对管理者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社会常态下的管理，而对社会非常态的风险，则缺乏应对的经验。随着风险社会的来临，我们需要强调危机风险管理的转型。同时，在风险管理中我们应当强调风险管理的人文导向这一在传统风险管理中重视不够的方面。

首先，面对风险社会的现实，危机管理面临着从传统的危机管理向危机风险管理的重大转型。传统的危机管理更多的是一种临时的应急行为，是一种被动的回应性行为，而不是一种具有前瞻性的预防行为。传统的危机管理很多依然是立足于危机，而不